

日本自民黨再執政的政治經濟基礎

蔡增家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1990 年之後在民主化的浪潮下，東亞長期一黨執政的國家紛紛歷經政黨交替，例如日本的自由民主黨在 1993 年歷經 38 年的執政之後，首次由野黨組成聯合政權而淪為在野黨，南韓的民主正義黨在歷經 32 年的軍人政權之後，也同樣在 1993 年由在野的金泳三當選大統領，台灣的國民黨也在執政 51 年之後，在 2000 年也首次由在野的民進黨執政。但是這三個國家最大的不同點是：日本的自民黨在 1993 年下台後卻能夠迅速在三年之後也就是 1996 年重新掌握政權，本文所要問的是為何日本自民黨能夠在短短的三年之內重掌政權？其究竟具備何種優勢與基礎呢？本文將從縱向與橫向兩個面向來剖析這個問題，在縱向方面就是自民黨內外環境因素，在橫向方面則是政治與經濟兩項基礎，本文發現日本自民黨在外環境政治基礎包括分裂的在野黨、弱勢及缺乏政治魅力的在野黨領袖、選區劃分的不平均，內環境基礎包括派閥政治二世的出現、族議員及官僚保守勢力的結合，外環境經濟基礎包含巨額公共建設鞏固地方票源、保護特定產業來獲得經濟團體的支持，內環境經濟基礎包含農協、醫師會、遺族會與各種業界團體的政治獻金、大企業對各派閥領袖研究會的政治獻金。這些因素相互交錯形成自民黨重新執政的堅強基石。本文結論認為這種政治經濟基礎雖然為自民黨再執政提供強而有力的基礎，但也成為目前小泉進行構造改革的最大阻力。

關鍵詞：自民黨、小泉純一郎、金泳三、日本



壹、前言

1990 年之後，東北亞主要國家紛紛歷經政黨輪替的過程，例如日本的自由民主黨在 1993 年 8 月歷經 38 年的執政之後，首次由野黨組成聯合政權而淪為在野黨，南韓的民主正義黨在歷經 32 年的軍人政權之後，也同樣在 1993 年由在野的金泳三當選大統領，台灣的國民黨也在執政 51 年之後，在 2000 年也首次由在野的民進黨執政。但是南韓的前執政黨—民主正義黨（現改為大國家黨）在 1993 年失去政權之後，於 1998 年的總統選舉當中卻仍然無法拿回政權，而日本自民黨卻能夠在喪失政權一年之後再度進入聯合政府當中，並在三年之後，也就是 1996 年 1 月重新再繼續執政並且屹立不搖。為何南韓大國家黨在失去政權之後便一直無法奪回執政權，¹ 而日本自民黨在失去政權不到三年便能夠再繼續執政呢？這是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

雖然現在自民黨是與他黨組成聯合政府的形式（目前是自民黨與公明黨及保守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但是自民黨在現今日本所有政黨當中仍然是最重要的，舉例來說，在本屆國會 480 名眾議員當中，自民黨籍有 232 名，民主黨有 127 名、公明黨有 31 人，自由黨 22 人，共產黨 20 人，社民黨 19 人，保守黨有 7 人，其他小黨 16 人，無所屬有 5 人，自民黨籍議員人數將近於第二大黨民主黨的兩倍（中央省廳改革委員會，2001: 126-285）。另外，根據日本放送電視台（NHK）在前年（2002）10 月 14 日針對日本所有政黨支持度所做的民意調查，自民黨得到的支持率達 28.1%，相對於最大在野黨民主黨的 4.6% 及公明黨的 2.5%，自民黨在政治支持度上遠遠高於日本其他政黨。² 最後，日本於 10 月 27 日進行參眾兩院七個選區的統一補缺選舉，以自

1 南韓總統選舉於前（2002）年 12 月舉行，國民統合 21 鄭夢準在最後關頭退出選舉，由民主黨盧武鉉擊敗大國家黨候選人李會昌，當選為第六任南韓大統領。請參閱 http://china.joins.com/big5/spec/list/presi_b.htm。

2 在前年 10 月 14 日 NHK 對 1400 名日本成年人的政黨支持度調查當中，其他政黨的支持度諸如自由黨為 1.4%、共產黨為 2.3%、社民黨為 1.6%，<http://www.nhk.or.jp/news/2002/10/16/k20021015000115.html>。



民黨爲主的三黨聯合政權推出的候選人贏得 5 席而獲得大勝，相對於最大反對黨民主黨只奪得 1 席承認慘敗，另外無黨派人士也贏得 1 席（讀賣新聞，2002：版 1）。由此可見，雖然自民黨背負金權政治與派閥主導的包袱，讓小泉的構造改革遭到相當大的政治阻力，使得日本經濟遲遲無法復甦，但在現今日本政黨體系當中，卻沒有一個政黨的政治實力能夠與自民黨匹敵。

本文所要問的是：爲何日本自民黨能夠在短短不到三年之內重掌政權？其究竟具備何種政治優勢與經濟基礎呢？本文將從縱向與橫向兩個面向來剖析這個問題，在縱向方面就是自民黨內外兩項環境因素，在橫向方面則是政治與經濟兩項基礎，本文發現日本自民黨在外在環境政治基礎包括分裂的在野黨、弱勢及缺乏政治魅力的在野黨領袖、以及選區劃分的不平均，內在環境基礎包括派閥政治二世的大量出現、及族議員³及官僚保守勢力的結合；外在環境經濟基礎包含以巨額公共建設投資來鞏固地方票源、保護特定產業來獲得經濟團體的支持，內在環境經濟基礎包含農協、醫師會、遺族會與各種業界團體的巨額政治獻金、以及大企業對黨內各派閥領袖研究會的政治獻金。這些因素相互交錯形成自民黨重新執政的堅強基石，但卻也是自民黨想要進行改革的最大阻力。

本文在內文方面總共區分成八個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前言，說明本文的主要論點及研究目的；其次第二部分是理論的探討，本文將以執政黨爲主體來分析其與經濟治理之間不同的互動關係；第三部分則是探討自民黨從 1993 年至 2001 年期間失去政權以及再執政的歷史過程；第四部分是將自民黨內部組織劃分成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來分析其組織的政經特性；第五及第六部份則是分別從內在環境與外在環境兩個面向來分析自民黨再執政的政治及經濟基礎；第七部分則是從理論的角度來檢證自民黨再執政的主要原因，並以小泉的構造改革（體制結構改革）爲例來說明日本進行改革的困境；

3 所謂「族議員」是指掌握政策決定的幕後黑手，並從中獲取利益的國會議員，這些議員經常對特定領域的政策特別精通與“關心”，並擁有極大的影響力，連高級官僚的人事權都能掌握。不過，因爲自民黨長期執政，以致幾乎都是自民黨議員才有這個稱呼，也可以說，族議員與自民黨的執政優勢密不可分。請參閱尹懷哲，「操控日本政治的族議員」，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日本綜合評論專論文章，<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pecial-f-15.htm>。

最後則是根據以上的分析來作簡單的結論。

貳、理論探討：執政黨與經濟治理

在東亞地區的國家當中，由於執政黨的長期一黨執政，執政黨對於國家經濟的治理及發展方向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過去發展國家論的著作當中大多以政府、企業與銀行三邊互動關係來解釋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成功因素，政府掌握銀行體系的資金來主導國家經濟政策，企業配合政府的政策以獲得低廉的資金來提昇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此，銀行體系便成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相互配合及互惠性同意的最重要中介因子，⁴而在政府、企業與銀行三個行為者當中，因為在東亞當中經濟發展典範的主要國家日本、南韓及台灣在過去都是由一黨長期執政的，執政黨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例如日本的自由民主黨、南韓的民主正義黨及台灣的國民黨，而很可惜的是在過去的發展國家論只有指出資金是政府掌控企業以貫徹經濟政策的最主要工具，但其並未指出長期一黨執政下的執政黨對於國家經濟政策會產生何種影響？而當執政黨輪替之後對於國家經濟又會造成何種衝擊？本文嘗試在本節當中使用理論基礎來解釋這種現象。

Gregory Noble 在 *Collective Action in East Asian* 這本書中以日本、南韓及台灣等三個東亞國家為例，來分析執政黨如何透過長期執政來維繫其與大企業之間的關係，Noble 認為執政黨與官僚體系是形塑國家工業政策的最主要行為者（1998: 22-24）；此外青木昌彥、奧野正寬及岡崎哲二在 *市場の役割，國家の役割*（市場的角色及國家的角色）這本書中，以官僚多元主義來分析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在日本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信

4 John Zysman,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Stephan Haggard, Sylvia Maxfield, and Ben Ross Schneider, eds.,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ulette Kurzer, *Business and Banking: Polit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Karl J. Field, *Enterprise and the State in Korea and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任官僚，並給予官僚極大行政權，是日本經濟在過去能夠避免政治介入，而快速發展的最主要原因（2000: 13-16）；最後，大山耕輔在《行政指導の政治經濟學》（行政指導的政治經濟學）這本書中指出：日本產業政策的形成，是由自民黨賦予官僚體系的行政指導權來監督企業對政策配合的程度，而其主要的政策工具便是銀行，也就是利用銀行利率的高低來掌控企業的政策導向（2001: 6）。

由此可見，在過去學者的研究分析當中，一黨長期執政的體制下會出現兩種政治現象，首先是官僚體系會向執政黨逐漸靠攏，形成相互依賴及結合的關係；在另一方面，國會當中會以執政黨為中心形成派閥，來為執政黨提供法案通過的合法性，而官僚體系與國會派閥相互結合保守勢力，不但對企業形成強力的政策指導，同時也為執政黨長期執政奠定基礎，這些根基是政黨輪替之後短期間所無法取代的。因此，我們可將執政黨與其他行為者的關係劃分成執政黨與官僚及執政黨與國會兩個面向，在執政黨與官僚方面，有執政黨與官僚結合及執政黨與官僚疏離兩種，在執政黨與國會方面，有執政黨與國會派閥結合及執政黨與國會派閥疏離兩種情況，⁵由以上執政黨與官僚、國會各兩種不同面向會形成四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第一種是執政黨與官僚結合同時執政黨在國會也是與派閥相互結合，例如1993年之前日本自民黨及1996年之後日本自民黨再執政時期便是屬於此種類型；第二種是執政黨與官僚結合但是執政黨在國會中卻與派閥疏離，例如1993年至1994年日本細川護熙期間便是屬於此種類型；第三種是執政黨與官僚疏離但是在國會中卻與派閥維持密切的關係，例如1994年至1996年村山富市期間便是屬於此種類型；第四種則是執政黨同時與官僚體系及國會中的派閥保持疏離，1998年之後南韓金大中政府便是屬於此種類型（表1）。⁶

5 有關日本選舉及國會重組，特別是1993年之後五五體制崩壞的轉變，請參閱 *Leviathan*。舉例來說，〈93 総選挙——55 年体制の崩壊〉，第15号（1994年秋）；〈政界再編の序曲〉，第17号（1995年秋）；〈変容する日欧の政党政治〉，第22号（1998年春）；〈90年代の政党政治と政策の変化〉，(32)号特集（2003年春）。

6 本文中所謂執政黨與官僚體系結合與疏離的主要區分點便是指執政黨與保守官僚的結合，以及執政黨與保守官僚釐清界限；而執政黨與國會派閥結合與疏離的主要區分點則是執政黨與利益團體為主的派閥相互結合，以及執政黨與利益團體為主體的派閥劃清界限。

表 1 執政黨與官僚及國會的關係

		執政黨與官僚	
		結合	疏離
執政黨與國會	派閥結合	日本自民黨 (1993 年之前) 自民黨再執政時期 (一九九六年至今)	村山富市期間 (1994-1996)
	派閥疏離	細川護熙期間 (1993-1994)	南韓金大中政府 (1998 年至今)

在執政黨與經濟治理關係方面，執政黨若能與保守官僚體系及國會當中的派閥釐清界限將是有利於經濟的治理與發展，這從 1998 年之後金大中政府上台之後實施一連串的金融改革，並成功的帶領南韓脫離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可以看出；而假若執政黨與保守官僚體系及國會當中的派閥相互結合將是不利於經濟的治理與發展，這從 1996 年自民黨再執政之後，橋本龍太郎所實施的金融改革及小泉純一郎所施行的構造改革都受到來自於國會派閥及保守官僚勢力的抵制，這同時也是日本經濟遲遲無法復甦的最主要原因；而 1994 年至 1996 年期間，社會黨籍的村山富市政府雖然與官僚體系維持疏離的關係，但在自民黨仍為聯合政府的一員的原由，使得村山的財政改革受到來自國會中自民黨保守派閥相當大的阻力；1993 至 1994 年的細川護熙政府，雖然與國會中派閥維持疏離的關係（因為細川的聯合政府並不包括自民黨），但其仍然與保守官僚相互結合，因此，在細川護熙任內便只有通過選舉制度改革法案，之後便因政權不穩而下台。

從以上對執政黨與經濟治理之間作理論性分析之後，我們發現在政黨輪替為常態的民主政治中，一個執政黨的改革成功主要是能夠擺脫保守官僚與傳統派閥的牽制，但是一個政黨能夠順利再執政保守官僚與國會派閥的支持卻也是功不可沒的，接下來便是要本文所要探討的案例—1996 年之後自民黨再執政的過程與基礎。日本自民黨從 1991 年在參議院失去多數黨地位之後，緊接著在 1993 年因為黨內分裂而又失去眾議院多數黨的地位，但是自民黨雖

然失去政權，但是其卻可以積極透過黨內派閥來與官僚體系結合，這是自民黨能夠迅速再執政的最主要關鍵。以下便就 90 年代之後自民黨失去政權以及再執政的歷史過程作分析。

參、自民黨失去政權與再執政的歷史過程 (1993-2001)

從 1955 年自由黨及民主黨保守合流以來，日本自民黨便一直是日本執政黨，在自民黨長期執政下，在外在環境自民黨管制資本的流動塑造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在內在環境上日本政府與企業形成互惠性的同意，並以銀行為企業主要資金的來源，創造日本戰後經濟的快速成長 (Calder, 1993: 28)。但在 1980 年代中期之後，因「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造成日圓大幅升值讓日本國內出現前所未有的泡沫經濟，在泡沫經濟的推波助瀾下，讓自民黨與企業之間利益輸送達到最高峰，而許多金權政治弊案也就在泡沫經濟後期及破滅之後紛紛出現，⁷ 例如 1988 年力古錄妥事件 (リクルト事件)、砂利污職事件以及 1992 年共和事件及佐川急便事件，這一連串事件造成日本人民對自民黨徹底失望。⁸

自民黨之所以在 1993 年失去執政權主要有內外兩項因素，在內部是自民黨內的分裂，1992 年 8 月爆發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涉嫌非法收受佐川急便會社 5 億日圓的政治獻金，而當時自民黨竹下派議員小澤一郎便在國會中對宮澤內閣提出不信任案，這讓自民黨內出現支持小澤及反對小澤兩派人馬，而在野黨支持下國會在 1993 年 6 月通過對宮澤的不信任案，小澤一郎旋即率領

7 所謂「廣場協議」是指在 1985 年美國召集英法德日等工業國家在紐約廣場飯店開會，為求解決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問題，在會中達成共識，以國際壓力讓日圓升值。雖然之後日本 80 年代的泡沫經濟並無法全部歸咎於日圓的急遽升值，但日圓升值卻是造成泡沫經濟的主因。請參閱蔡增家，〈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政治分析 (1985-2001)〉，黃秀端主編，《政治學的發展：新議題與新挑戰》，台北：韋伯出版社，2003 年 1 月，頁 369-399。

8 有關 1988 年力古錄妥事件 (リクルト事件)、砂利污職事件以及 1992 年共和事件及佐川急便事件，請參閱富森馭兒，《日本型民主主義の構圖》，東京：朝日新聞社，1993 年。

許多青壯派議員退出自民黨，另組新進黨投入國會選舉（Curtis, 1999: 114-116），以至於造成在 1993 年自民黨在國會中的席次無法過半，而失去執政權，由新生黨為主體的 7 個小黨（這 7 個小黨包括新生黨、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日本新黨、新黨先驅及社民連）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執政，而推派新生黨黨魁細川護熙為首相，細川是 38 年以來第一位在野黨出身的日本總理大臣（Christensen, 2000: 187-188）。

在外部則是金權醜聞的衝擊，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日本自民黨出現一連串黨內派閥領袖與企業之間官商勾結的醜聞，例如 1988 年爆發力古錄妥會社涉嫌將未上市股票非法讓渡給當時首相中曾根康弘及眾議員藤波正孝及江副浩正，而藤波及江副皆被起訴；1992 年鋼骨共和會社涉嫌非法向眾議員阿部文男及鈴木善幸行賄造成阿部被起訴，之後更爆發當時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及前首相竹下登向佐川急便社長索取非法政治獻金 5 億日圓，結果造成金丸信去職及被起訴，這一連串涉及自民黨高層的官商利益輸送弊案，使得日本人民徹底對自民黨失去信心（富森馭兒，1993: 99）。

自民黨在 1993 年 8 月宮澤喜一下台正式宣告失去政權之後，從 1993 年至 2001 年為止，日本政治發展約略可以劃分成在野連立政府時期、自民黨連立政府時期及小泉構造改革等三個時期，其中自民黨真正失去政權的時間只有在野連立政府時期的兩年半期間，其餘兩個時期都是以自民黨為主體再與其他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以下便分別就這三個時期加以論述。

（一）在野連立政府時期

所謂在野連立政府時期是只由之前的在野黨所組成聯合政府，在這個政府體制當中是排除自民黨的，在野連立政府時期從 1993 年 8 月 6 日新生黨細川護熙上台至 1996 年 1 月 11 日自民黨橋本龍太郎上台為止，總計約有 30 個月的時間，在這期間除了短暫的羽田孜政權之外（64 天），主要有新生黨的細川護熙及社會黨的村山富市兩位首相。

1. 細川護熙時期(1993-1994)：細川護熙在 1993 年 8 月就任為日本總理大臣，結束自一九五五年以來自民黨的長期執政，細川就任之後以終結 80 年代末期以來政商勾結的金權政治為最終目標，因此便積極對日本進行政治改

革，在其內閣時期最大的政績便是通過「政治改革四法案」來改革日本的選舉制度，將日本的選舉制度從中選區制（複數選區單一不可讓渡投票制，SNTV）改革為單一選區並立制（和田英夫，1994: 6-7⁹）。細川擔任首相不到一年就因聯合政府內部分裂而被倒閣，由社會黨（現改為社民黨）、自民黨及新黨先驅（新黨さきがけ）組成聯合政府，共推社會黨村山富市為首相。⁹

2. 村山富市時期(1994-1996)：村山富市於1994年7月就任為日本總理大臣，這是日本戰後從片山哲以來第二位社會黨籍的首相，村山的連立政府與細川政府最大的不同點便是細川連立政府是將自民黨排除在外而村山的連立政府是與自民黨共同的組合，而村山內閣任內最大的政績便是對日本進行財政改革及住宅專用銀行的處置，村山富市任內主要的政績皆集中在經濟改革，但村山任內許多重大政治改革法案皆無法在國會中通過，其最主要原因便是其連立政府是社會黨與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而遭受到來自自民黨內派閥的抵制（Pempel, 1998: 142-143）。村山擔任首相兩年之後在1996年國會大選中，自民黨獲得最高席次，才由自民黨與其他三黨組閣，並由自民黨的橋本龍太郎擔任首相。

由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在野連立政府時期，雖然能夠在國會中過半而順利通過「政治改革四法案」、「財政改革關連法案」以及「住宅專用銀行處置法案」，但是自民黨與保守官僚對於政策的抵制卻也造成在野連立政府的政策無法順利施行，換句話說，細川政府受到來自保守官僚的抵制，而村山更是遭受到自民黨派閥及官僚體制的聯合抵制。

(二)自民黨連立政府時期

1996年日本進行國會大選，這是日本第一次使用單一選區並立制的新選舉制度，而這次大選結果由自民黨重新獲得執政權，而此時自民黨的執政與1993年之前是不相同的，9年之前自民黨在國會席次足以過半而是單獨執

9 在細川內閣與村山內閣當中曾經有一個短暫的羽田孜內閣，其只有維持短短的64天便被倒閣，是日本戰後僅次於東久邇宮揆彥（54天）的第二短命內閣。Gerald Curtis, *The Logic of Japanese Politics: Leader, Institutions, and the Limits of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56.

政，而 1996 年之後則是聯合政府的型態，因為自民黨無法在國會中取得過半席次，而必須與它黨相互結合，例如 1996 年橋本龍太郎政府是自民黨、社民黨外加新黨さきがけ所組成的聯合政府，1999 年小淵惠三政府則是自民黨與自由黨外加公明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2000 年森喜朗及 2001 年的小泉政府則是自民黨、公明黨加保守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瀧澤中，2001: 23-24。）。

1996 年自民黨重拾執政權之後是由橋本派領導橋本龍太郎組閣，橋本上台之後拋棄過去以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的政策，極力推動「金融改革」(Big Bang)，在金融改革的架構下，一方面引進金融控股制度，另一方面則是鼓勵銀行之間的合併以打消金融體系的不良債權；在金融管制方面，則是成立金融監督廳來監督銀行體系，但是在橋本任內，卻在黨內派閥壓力下不對企業加稅，反而通過消費稅的法案，將現行 3% 提高至 5%，這使得原本出現復甦曙光的日本經濟，又再度因人民不願意消費而又停頓下來，橋本也因為消費稅在 1998 年 7 月辭職下台，由同黨的小淵惠三繼任 (Norville, 1998: 121-125)。

小淵惠三上台之後，積極推動中央省廳的改革及通過政治資金規正法，在中央省廳改革方面，小淵將過去 1 府 22 省廳精編為 1 府 12 省廳，最重要的便是將過去掌管金融政策及業務管理的大藏省，將其權責分散為掌管金融監督的金融廳及金融政策的財務省，並將匯率政策回歸於日本銀行 (Bank of Japan) (中央省廳改革研究會編集，2000: 2)；在政治資金規正法方面，則是嚴格禁止財團對政治人物個人的政治獻金，並對企業與政黨之間的政治獻金設限 (政治資金制度研究會編集，2001: 179)。小淵於 2000 年 4 月不幸在任內過世，由同屬自民黨的森喜朗接任首相，而森喜朗則是推動銀行的合併，由體質好的銀行來接管合併體質較差的銀行，在森喜朗任內將過去 12 大銀行體系合併為 4 大銀行體系，另一方面，則是引進外資接管瀕臨破產日本長期信用銀行 (Lawrence, 2001: 180-183)。但是森擔任首相才一年左右便又宣告下台，由派閥色彩不強小泉純一郎當選自民黨總裁。

(三) 小泉構造改革時期

從 1996 年自民黨執政至 2001 年森喜朗為止，自民黨又再執政 5 年了，



但是日本經濟仍然沒有起色，這就促成自民黨內改革派小泉純一郎的出線，小泉在黨內派閥色彩並不明顯，同時相當特立獨行，這是不同於過去自民黨內派閥的政治人物，小泉上台之後打著「構造改革」的大旗，小泉構造改革的內容在政治方面包括政府體制改造、政府財政赤字的降低及既得權的縮減，在經濟方面則包括銀行不良債權的降低、企業過剩狀態的改善、企業交叉持股習性的轉變及企業僱用型態的改變（田中直毅，2001: 61-72。），但是卻接連遭到自民黨內派閥的牽制及來自保守官僚的抵制，因此，小泉就任至今給外界的感覺便是口號大於實際，而日本經濟一直至今都尚未復甦。

由以上對自民黨連立政權的分析我們發現自民黨內派閥的勢力並沒有隨著自民黨在 1993 年至 1996 年期間下台而消失，國會族議員及保守官僚體系仍然是自民黨政權基礎的最佳護衛者，這也是橋本龍太郎寧願冒著下台的危機來提高消費稅，也不願意對企業增稅的最主要原因，同時也是小淵政府在政治資金規正法中，禁止財團對政治人物個人的政治獻金，而只對企業與政黨之間的政治獻金設限的最重要原因，而這也是森喜朗不願讓銀行倒閉而積極推動銀行體系合併的最主要原因，而這同時也是小泉構造改革無法推動的主要原因，當然這同時也是目前日本經濟遲遲無法復甦，並面臨財政赤字與銀行不良債權雙重危機的最重要因素。而下一節便是要從自民黨組織特性來分析為何歷經 3 年的下台，自民黨派閥為何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

肆、自民黨的組織特性

在分析自民黨失去政權及再執政的過程之後，我們發現自民黨再執政這 6 年期間日本經濟仍然沒有起色，以實際的經濟數字來看，在 1996 年日本經濟成長率為 2%，日經股價指數為 21000 點，失業率為 3.2%，但在 2001 年日本經濟成長率為 -1%，日經股價指數為 9000 點，失業率超過 5% (<http://www.dgbasey.gov.tw/dgbas03/bs5/quarter/>)，但是自民黨卻仍舊是日本政治當中，最重要也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政黨，自民黨政權仍然相當穩固，為何會有這種奇特的情形發生呢？本節將先從自民黨內部組織的特性來加以探討。



(一)正式組織

自民黨的組織架構可以區分為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兩種，在正式組織方面，重要的政治職位有總裁、副總裁以及黨三役（幹事長、總務會長及政務調查會長），在過去自民黨長期執政時期，自民黨總裁順理成章必定是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而副總裁則是總裁不在時接替總裁的職位，直接隸屬於總裁之下的組織有黨役員會（黨員代表會）、選舉對策本部、人事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其中黨役員會負責黨員的聯繫與動員，選舉對策本部負責選舉策略基調的擬定，人事委員會負責候選人提名及黨內各局處的人事安排，財務委員會則是負責黨內財務的籌措與運用（<http://www.jimin.jp/>）。接下來便是要分析自民黨組織當中最重要黨三役一幹事長、總務會長及政調會長，其中幹事長負責國會，總務會長負責黨務，政調會長負責政策。

1. 幹事長：自民黨幹事長是自民黨在國會當中實際最高的負責人，其主要職責在於國會對策、政治資金的調度與分配，以及黨組織內部人事權及選舉對策，其底下有政策審議會、政治倫理審查會及國會對策委員會，其是自民黨與國會之間主要溝通的橋樑，也是黨三役當中排名第一的政治職位，目前自民黨幹事長為山崎派掌門人山崎拓（中央省廳改革委員會編集，2001: 57）。

2. 總務會長：自民黨總務會長相當於黨內的秘書長，主要是負責協調國會與政黨意思的傳達，其底下主要有組織本部及廣報本部，組織本部包括組織局、女性局、青年局、勞政局及遊說局；廣報本部包括新聞局、廣報局及報導局，其是自民黨組織本部當中最重要政治職位，目前自民黨總務會長是堀內派掌門人堀內光雄（<http://www.jimin.jp/>）。

3. 政調會長：自民黨政調會長相當於黨內政策部長，其主要是負責法案與預算的訂定與分配，在過去自民黨長期執政時，政調會是政府政策最主要形成的機關，其底下有總合政策研究所及政策調查審議會，並依據政府內閣組織及國會委員會成立各種不同的調查委員會，而這些調查委員會的會長便是下一屆部會首長的不二人選，目前自民黨政調會長是河野派的麻生太郎（中央省廳改革委員會編集，2001: 58）。



(二)非正式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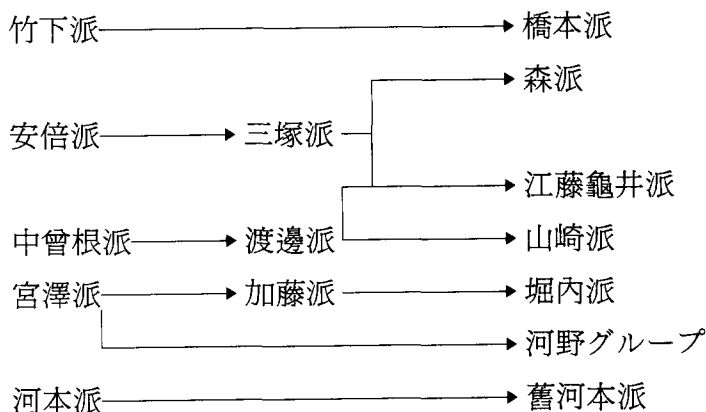
在日本獨特的政治文化下，在正式組織的架構下通常會存在著非正式組織，而這些非正式組織有時其政治影響力是大過於正式組織，在自民黨內主要的非正式組織方面有派閥及族議員，所謂派閥便是指自民黨內由個人為主體所組成非正式的政治團體，而派閥的領導人通常要負責派閥內所有競選支出及日常開銷的募集，在過去日本總理大臣也是由各大派閥掌門人輪流擔任，而一個派閥在黨內勢力的大小是由隸屬於派閥內議員人數的多寡；而族議員是指許多長期在政調會及國會中特定委員會的國會議員，其許多都是相關部會的官員退休，之後代表自民黨參選進入國會，然後長期關注特定的議題，目前勢力最大的有金融族及建設族議員（Johnson, 1995: 165）。

在黨內派閥方面，過去自民黨內有所謂的五大派閥：田中派（原佐藤榮作派）、宮澤派（原池田勇人派）、中曾根派（原河野一郎派）、安倍派（原岸信介派）及河本派（原三木武夫派），在這五大派閥當中有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福田赳夫及佐藤榮作擔任過日本總理大臣。而目前自民黨內的主要派閥有橋本派、森派、江藤龜井派、山崎派、堀內派、河野グループ以及舊河本派，其中橋本派師承竹下派，竹下派即為佐藤、田中派的延續，目前為自民黨內最大派閥，森派及江藤龜井派是由三塚派分裂而成的，而三塚派則為福田派的延續，目前森派是黨內第二大派閥，而山崎派則是由渡邊派演變而來的，渡邊派為中曾根派的延續，而渡邊派也有部分議員加入江藤龜井派，堀內派則是由加藤派演變而來的，堀內派則為延續前尾、宮澤派，而河野グループ則是從宮澤派分裂出來的，舊河本派則是師承河本派，河本派則是三木派的延續（圖 1），¹⁰ 而在目前這七大派閥當中有橋本龍太郎、森喜朗及小泉純一郎擔任過日本首相，這些黨內派閥實際操縱著自民黨政策的執行與運作。

10 目前在日本國會當中橋本派有一百零二席，森派有六十席，加藤派（分裂成山崎派及堀內派）也有六十席，江藤龜井派有五十五席，河野派則有十二席。



圖 1 最近自民黨內派閥的演變



在族議員方面，過去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時期自民黨內有所謂五大族議員，其分別是金融族議員、建設族議員、農林族議員、郵政族議員及運輸族議員，這些族議員有兩項重要特性：首先就是這五大族議員所關注的議題都是涉及到重要的經濟利益，例如金融族議員便是有關大藏省業務（現改為財務省），負責銀行自由化與合併業務，郵政族議員關注日本分布最廣及存款最多的郵局業務，農林族議員則是關注自民黨最大票倉農村的道路建設及稻米價格與進口管制；¹¹ 其次是這些族議員大多是相關部會的官僚出身的，而這些前官僚在日本官場講求輩分倫理的文化下通常可以掌控目前執行政策的部會官員，例如農林族議員市川一郎便是前建設省官員，金融族議員塩崎恭久便是前經濟企劃廳官員出身，經濟族議員坂本剛二便是前通商產業省官僚出身（Hartcher, 1998: 42-44）。這些族議員憑著其專業性實際掌控著自民黨在國會當中的法案政策運作，並與官僚體系密切合作來達成政策的有效性。

(三)自民黨組織的特性

由以上自民黨內的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我們可以了解自民黨組織架構實有以下三種特性：

11 請參閱湯淺博，《自民党政調と霞關國會族議員》，東京：教育社，1986年。舛添要一，《政治ニュースがおかる本》，東京：池田書店，2001年，頁160-161。

1. 強調倫理輩分的組織：在自民黨內是相當強調資深制與倫理輩分的，這不論是在派閥體系內或是黨內組織政治職位的傳承都是一項重要的考量，例如初次當選國會議員則有資格競選國會各委員會委員及國對委員及政調會當然委員；當選兩次國會議員則有資格競選政調會及國對會的副部會長；當選三次的國會議員則是有資格競逐部會的政務次官；當選四次以上則是有資格擔任副大臣；當選五次則是擔任政務調查會長及部會大臣，當選六次以上則是成為族議員及黨內派閥領導者（中央省廳改革委員會編集，2001: 126-139）。

2. 非正式組織的實力大於正式組織：在自民黨的組織架構當中，我們發現非正式組織當中派閥及族議員是實際操縱著日本政治的運作，例如派閥掌控著黨內政治資源的分配及選舉提名的策略，族議員負責國會當中所有法案的規劃與審查，這些組織特性在自民黨正式組織中是完全看不出來的。舉例來說，在日本公共事業當中規模最大的日本道路公團，其八位委員當中有四位是建設省出身，而一位是大藏省出身。¹²

3. 勢力強大的後援會：在自民黨的外圍組織當中，依據各族議員的議題劃分出現許多不同的後援會，這些後援會成為族議員在國會中與官僚協商最有利的後盾。舉例來說，在2001年自民黨總裁選舉時自民黨內各主要後援業界團體眾多，地域黨員有75萬9千人，大樹會（郵局長會）有23萬9千6百人，建設會有18萬2千5百人，軍恩會有15萬4千5百人，看護聯盟有12萬4千人，醫師會有11萬5千人，遺族會有11萬人，土地改良會有9萬3千人，宅建會有9萬2千人，日本電車會有7萬9千人，其他職業共有41萬7千人（橋本五郎、飯田政之、加藤秀治郎，2002: 129）。

12 其分別是建設省事務次官出身的藤井治芳、大臣官房總務審議官出身的村瀬興一、國土廳長官官房會計課長森悠、關東地方建設局長辻靖三及印刷局長出身的妹尾喜三郎。新藤宗幸，《技術官僚：その權力と病理》，東京：岩波書局，2002年，頁120。

伍、自民黨再執政的政治經濟基礎

一、自民黨再執政的政治基礎

從以上分析自民黨內部組織架構及非正式組織的運作之後，我們發現自民黨以派閥及族議員為中心來連結其與國會及官僚之間的互動關係，接下來便是要從內外環境兩個面向來探討自民黨能夠再執政究竟是具備何種政治基礎，換句話說，也就是內外環境的動態連結。

(一) 外在環境：

在自民黨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方面，本文認為自民黨能夠再執政有分裂的在野黨、缺乏政治魅力的在野黨領袖及選區劃分的不平均等三項消極條件，以下便分別就這三點因素來加以分析。

1. 分裂的在野黨：在過去日本主要反對黨為社會黨、共產黨及公明黨，社會黨及共產黨為左派政黨，而公明黨則是佛教政黨以宗教為其主要訴求，創價學會及創價大學為公明黨主要的外圍組織，而其中社會黨一直是最大的在野黨，但是在議題分歧及薄弱性下一直無法吸引主流選民的青睞，1990年之後新興的民主黨、保守黨與自由黨都是由自民黨及社會黨中分裂出去的，¹³ 1996年社會黨村山富市下台之後，社會黨在眾議院席次更萎縮到只有19席，比公明黨的31席還少（舛添要一，2001: 119。），在野黨之間彼此因為議題分歧而無法整合，讓自民黨的政治勢力一直遠遠超過在野黨。

2. 缺乏政治魅力的在野黨領袖：從五五體制以來，日本主要在野政黨便是社會黨（現改為社民黨），但是社會黨在1996年之後的席次便大幅縮減，現在只有19席，而現今最大在野黨民主黨（擁有127席）黨代表（黨魁）鳩山由紀夫給外界的感覺便是相當軟弱，另外一位民主黨政治人物菅直人則又缺乏群眾魅力，而從自民黨分裂出去的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給外界的印象

13 請參閱石川眞澄，〈社會黨四十四年の歩み〉，高富通敏，《社會黨：万年野党から抜け出せるか》，東京：岩波書局，1898年，頁36-38。



是燥進及不成熟的政治人物，同時政治立場並不堅定，¹⁴這也是日本選民在自民黨派閥主導及金權政治充斥的情況下，仍然把票投給自民黨的最主要原因。

3. 選區劃分的不平均：日本選區的劃分並非依照人口的多寡，而是依照行政區域的劃分，舉例來說在全日本最大選區神奈川縣十四區與最小選區島根縣三區，兩者選民相差 2.47 倍，在神奈川 14 區選民有 473218 位，而島根 3 區則只有 191496 位，另外在全國應當選門檻最高的前五位選區全部集中在東京、神奈川及名古屋等大都市，而當選門檻最低的五個選區則全集中在島根、高知及德島等農業縣。¹⁵這種農村與都市差異性的選票結構，讓主要選票基礎集中在農業縣份的自民黨，在選舉當中獲得相當大的政治優勢。

(二)內在環境：

在自民黨與內在環境的互動關係方面，本文認為有族議員與保守官僚體系的結合及政治二世的大量出線等兩項因素，以下便分別就這兩點因素來加以分析。

1. 族議員與保守官僚體系的結合：族議員與官僚體系的密切配合在過去創造日本高度經濟成成長的奇蹟，但在自民黨再執政之後族議員與保守官僚的結合卻成爲改革的主要阻力，因此在小泉構造改革當中其所遇到的最大阻力並非是來自於在野黨，而是來自於黨內族議員與保守官僚勢力的結合，舉例來說，田中眞紀子是推小泉當選首相的最大功臣，因此小泉在就任之初便推舉田中擔任外務大臣，而田中直率及凡事躬親的個性與傳統外務大臣並不相同，於是便得罪外務省官員，外務省官員便結合自民黨派閥拉田中下馬，由鈴木宗男發難以阿富汗經援事件爲理由讓田中眞紀子下台（讀賣新聞，2002年：版2）。

14 現任民主黨黨代表爲菅直人。原彬久，《戰後史のなかの日本社會党》，東京：中公新書，2000年，頁293-294。

15 當選門檻最高的前五位選區依次爲神奈川十四區、神奈川七區、東京二十二區、愛知十區及愛知六區；當選門檻最低的五個選區依次爲島根三區、高知三區、島根二區、島根一區及德島三區。舛添要一，《政治ニュースがおかる本》，東京：池田書店，2001年，頁105。

2. 政治二世的大量出線：在自民黨有計劃栽培政治二世的政策下，許多派閥領導人的子女皆繼承其政治職位，例如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兒子福田康夫目前為內閣官房長官，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兒子石原伸晃目前為自民黨民營化推進改革本部長；另外，再以這屆日本自民黨眾議員的調查為例，在自民黨全部 233 名議員當中出身官僚體系有 84 名，佔 36%，出身地方政界有 51 名，佔 22%，出身政治世襲的有 19 名，佔 7%，在當選回數方面，新當選者只有 29 名，佔 12%，當選 2 回有 45 名，佔 20%，當選 3 回有 36 名，佔 16%（表 2）。¹⁶

表 2 日本眾議院自民黨議員調查表

出身	官僚體系	地方政界	政治世襲	學界	其他	總計
人數	84	51	19	7	72	233
比例	36%	22%	8%	3%	31%	100%

當選回數	1 回	2 回	3 回	4 回	5 回	6-9 回	10 回以上	總計
人數	29	45	36	29	22	50	22	233
比例	12%	20%	16%	12%	9%	22%	9%	100%

資料來源：《官界，官廳人事錄：2001 年以降省廳新体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 年，頁 126-285，38-40。

二、自民黨再執政的經濟基礎

在分析自民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之後，我們發現自民黨強大的政治基礎讓日本選民對於換人及換黨的期待性低落，所以對官僚的期待大於政治家，因此日本的投票率一向偏低，讓自民黨的組織戰能夠屢次奏效。接下來仍擬從內外環境兩項因素來分析自民黨能夠再執政的經濟基礎。

16 作者根據《官界，官廳人事錄：2001 年以降省廳新体制》人事資料整理而成，請參閱《官界，官廳人事錄：2001 年以降省廳新体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 年，頁 126-285，38-40。



(一)外在環境

在自民黨執政經濟基礎的外在環境上，主要是想要分析自民黨如何利用其組織特性來從經濟利益上去鞏固選票，而其主要利用的組織便是黨內派閥及後援會，自民黨主要票倉在農業縣份，因此，其經濟利益的主要受益者都是集中在農業縣份，以下將其區分為鉅額的地方公共工程補助及保護特定農產業兩個面向來加以分析。

1. 鉅額的地方公共工程補助款：在自民黨各主要派閥領袖的背後皆有所屬的後援團體，例如田中角榮的越山會及加藤紘一的宏池會，這些後援會有兩項目的，首先是可以透過這些後援會來募集政治資金，其次也可以將補助款透過這些後援會撥給選區來鞏固選票。以表 3 為例在 2001 年的統計，根據自民黨內主要派閥及派領導人所屬的後援會從當年政治資金前十位排行的情況看來，第一名為隸屬江藤龜井派的志帥會，其政治募集資金高達 30420 萬

表 3 自民黨派閥領袖各後援會政治資金募集排行(2001)

單位：千円

排名	後援會名稱	隸屬派閥及個人	總收入
1	志帥會	江藤龜井派	304200
2	平成研究會	橋本派	303399
3	社會計劃研究會	加藤派	259970
4	宏池會	加藤派	243845
5	平沼會	平沼赳夫	231300
6	清和政策研究會	森派	211060
7	拓政會	山崎拓	177176
8	秀政會	中川秀直	158629
9	春風會	森喜朗	155100
10	幸政會	尾身幸次	149086

資料來源：橋本五郎、飯田政之、加藤秀治郎，《日本政治の小百科》，東京：一藝社，2002年，頁133。



日圓，第二名為黨內最大派閥橋本派的志成研究會，其在當年募集的資金有 30339 萬日圓，加藤派則有社會計劃研究會及宏池會，其總共募集政治資金有 50381 萬日圓，在森派方面則有清和政治研究會及森喜朗個人的春風會，其總計募集 36160 萬日圓，其他則有山崎拓的拓政會（17717 萬日圓）、中川秀直的秀政會（15862 萬日圓）及尾身幸次的幸次會（14908 萬日圓）（橋本五郎、飯田政之、加藤秀治郎，2002: 133）。

2. 保護特定農產業：農協是自民黨在民間最大的支持團體，自 1947 年農業協同組合法成立以來，規定組合成員必須為農民，其有屬於其個別的生產、信用、共濟及販賣系統，農協系統主要可以區分為全國、都道府及市町村等三個位階，以及總合農協及專門農協兩個系統，在全國位階方面總合農協系統主要有全國農協中央會、全國農協連合會、全國共濟農協連合會以及農林中央金庫，而專門農協系統則有全國專門農協連合會；在都道府位階方面，在總合農協系統主要有縣農協中央會、縣信用農協連合會、縣經濟農協連合會以及縣共濟農協連合會，在專門農協系統則有縣專門農協連合會；在市町村位階則就是分屬總合農協及專門農協系統的組合員，至 2000 年為止日本全國總共有 1411 個農協組織，這些農協在選舉期間是自民黨最大組織動員的系統，同時也是自民黨政策保護最主要的獲利者（中村靖彥，2000: 26-27）。

（二）內在環境

在經濟內在環境上主要是探討自民黨外圍的專門團體，自民黨的外圍團體相當多，有建設業、銀行業、自動車業、醫師業以及全國特定郵局等，以下便就經濟四團體、醫生會及遺族會等三個團體來加以分析。

1. 經濟四團體：經濟四團體是與自民黨最密切的經濟團體，其主要有經濟團體連合會（經團連）、日本經營者團體連盟（日經連）、經濟同友會（同友會）以及日本商工會議所（日商），其中經團連是日本業界的大本營，所有參予者幾乎是日本大企業，目前也是約有 1000 個企業團體加盟，是日本政府與業界最主要的溝通管道。日經連主要是處理業者與勞工之間的勞資糾紛，目前加入的業界團體有 100 家。經濟同友會是個人企業主要的加盟團體，針對個人企業的利益向政府建言，目前約有 1400 個企業團體加入。日商會議所

主要是由各地的商工會議所所組成的，其組織最嚴密規模也最龐大，其主要成員是散居在各地的中小企業團體（Richardson, 1997: 147-148）。這四個經濟團體是自民黨派閥政治資金最主要的來源。

2. 醫師會及遺族會：日本醫師會目前會員人數有 115189 人，其主要是以爭取醫師的權益為主；日本遺族會主要是由歷年來因戰爭身亡其遺族所組成的團體，目前總人數為 110277 人，其通常會針對遺族年金受給的問題向自民黨政府爭取權利，這兩個自民黨主要後援團體人數雖然不多，但卻是後援會當中政治捐獻最多的團體，這也是日本醫療費用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瀧澤中，2001: 43）。根據統計，在 2001 年自民黨內各派閥的政治資金收入依多寡依序，首先為加藤派的 48800 萬圓、橋本派的 48500 萬圓、森派的 32700 萬圓、山崎派的 31700 萬圓、高村派的 12900 萬圓、河野グループ派的 5800 萬圓以及堀內派的 4100 萬圓（表 4）（橋本五郎、飯田政之、加藤秀治郎，2002: 145）。

表 4 自民黨內各派閥的政治資金總收入(2001)

加藤派	橋本派	江藤龜井派	森派
4 億 8800 萬圓	4 億 8500 萬圓	4 億 6700 萬圓	3 億 2700 萬圓
山崎派	高村派	河野グループ派	堀內派
3 億 1700 萬圓	1 億 2900 萬圓	5800 萬圓	4100 萬圓

資料來源：橋本五郎、飯田政之、加藤秀治郎，《日本政治の小百科》，東京：一藝社，2002 年，頁 145。

陸、執政黨、官僚體系與派閥：以小泉構造改革為例

從以上分析自民黨再執政的政治經濟基礎，我們發現自民黨以派閥及族議員為基礎，再運用自民黨內非正式組織來操作以達到執政的目的，而從理論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再執政的政黨若要能夠改革成功，則必須要與保守官僚體系及國會派閥保持適當的距離，南韓金大中從 1998 年以來的改革成功，便提供一個相當好的例證，而村山富市及細川護熙都因為與保守官僚或

是國會派閥疏離而無法繼續執政。但是這種執政黨、官僚與派閥的相互結合體雖然讓自民黨達成再執政的基礎，但也是自民黨目前改革的最大阻力，以下將以小泉純一郎就任以來所施行的構造改革為例加以說明。

小泉的構造改革約略可以劃分成兩個面向：首先是解決泡沫經濟之後的後遺症，另外就是改造現有的政經體制。在解決泡沫經濟的後遺症方面可以區分成銀行的不良債權、政府的財政赤字及公營機關無效率的狀態等三項，而解決不良債權的方案則有不良債權的最終處理方案及產業重整，解決財政赤字則有稅制年金歲出構造的財政改革，解決公營機關無效率則有規制緩和的民營化措施（齋藤精一郎，2001: 39）；在改造現有的政經體制方面則可以區分成肥大化政府、企業交叉持股習性、既得利益者的普遍存在、日本的僱用慣行以及弱者保護的立法等五項（塚崎公義，2001: 15）。

由此可見，小泉的構造改革其實重點便在於財政體制的改革，也就是要減少過去公共工程不必要的浪費，這引起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強力反對，根據河野龍太郎的研究在過去依人口數與公共投資比例來看，農業縣的高知、島根及宮崎縣是每人獲得公共投資數最高的三個縣，高達 20%，而東京大阪及名古屋所在的愛知縣則是最低的三個地區，只有不到 5%（河野龍太郎，2001: 34。），而這些公共工程的最大受益者便是大部分來自農業縣的自民黨議員，這些議員除了利用這些公共工程來鞏固選票基礎之外，其樁腳通常是這些公共工程的主要建設者，因此，議員與樁腳其實便是這些公共工程的利益輸送團體，所以，小泉財政的改革當然會引起這些派閥的強力反彈。

另外，小泉最主要是郵政法人民營化的工程，郵政法人在過去長久以來一直是郵政省（行政改革之後併入總務省成為郵政廳）最主要的權利來源，小泉陸續將一些特殊法人民營化，無疑是要削減官僚的行政權利，這引起保守官僚體系的強力反彈，況且在過去郵政體系一直是日本人民最主要資金的儲存所，郵政體系龐大的從業人員在選舉時候也是相當大的票源，在國會當中，也有郵政族議員為郵政體系代言，而小泉特殊法人民營化自然會引起保守官僚與族議員之間力量結合的反對。另外，道路特訂財源的構造改革則引起國土交通省及全國 660 萬人的強力反彈，不要忘了在國會當中還有建設族議員正在等著修理小泉，由此可見構造改革的困難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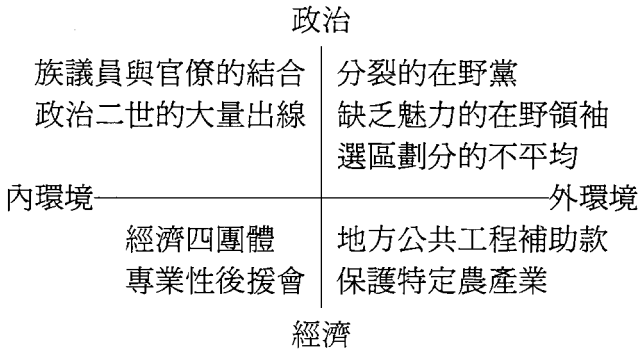
在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小泉政治佈局，在黨內方面，小泉上台後自民黨黨三役分別是政務調查會長為河野派的麻生太郎，幹事長為山崎派的山崎拓，總務會長為堀內派的堀內光雄，在內閣方面，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森派）、總務大臣片山虎之助（橋本派）、法務大臣森山眞弓（河本派）、財務大臣塩川正十郎（森派）、經濟產業大臣平沼赳夫（江藤龜井派）、外務大臣田中真紀子（無所屬）、農水大臣武部勤（山崎派）、環境大臣大木浩（橋本派）、防衛廳長官中谷元（加藤派）、金融政策業務大臣柳澤伯夫（加藤派）、行政改革特任大臣石原伸晃（加藤派）、國家公安委員長村井仁（橋本派）、沖繩北方及科技大臣尾身幸次（森派）、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保守黨）、厚生勞動大臣坂口力（公明黨）、文部科學大臣遠山敦子（民間人士）、經濟財政政策特任大臣竹中平藏（民間人士），總計在小泉內閣當中自民黨內森派有三位、橋本派有三位、加藤派有三位、河本派有一位、江藤龜井派有一位、自民黨無所屬一位，另外其他政黨有兩位，民間人士有一位，¹⁷ 由此可見，小泉不論在黨內佈局及內閣人士都是以黨內派閥平衡為主要考量，與當初要打破派閥分贓的論述有很大的改變。

接下來便是要看這種政治體制對日本經濟復甦的影響，小泉自從 2001 年打出構造改革的口號以來，至今已經接近三年了，但是給外界的印象卻是口號多於實際，我們可以用實際的經濟數據及政治事實來加以驗證，首先我們來看現今的經濟數據，至 2002 年第 2 季為止，日本經濟成長率為 -1.0%，國內失業率仍達 5.6%，為戰後以來的最高點，東京證券市場於 10 月 7 日損破 9000 點大關，成為 8539 點，是從泡沫經濟以來的新低點股票 (<http://www.dgbasey.gov.tw/dgbas03/bs5/quarter.html>)。另外根據日本 2002 年度的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的經濟景氣在通貨緊縮及經濟低迷的相互作用下，加上美國景氣停滯不前的影響，期望日本景氣在短期內復甦可能並不樂觀，其主要原因來自金融問題，因銀行龐大的呆壞帳及股市不振而造成金融仲介機

17 文中內閣人士名單是小泉在 2001 年 4 月首次組閣時的名單，小泉在前（2002）年 10 月有做小幅更改，例如外務大臣田中真紀子已於 2002 年 8 月 9 日辭去外務大臣職位，由山口順子接任，文後將會有進一步的論述。《政界、官廳人事錄》，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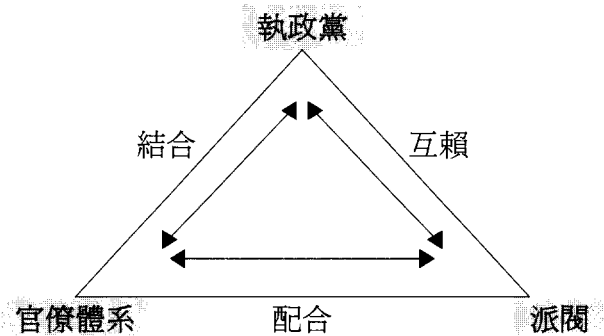
能低落 (www.nhk.or.jp/news/2002/11/05/k20021105000033.html)。由此可見，在小泉歷經近兩年的改革日本的經濟情況仍然是相當不樂觀。

圖 2 自民黨再執政的政治經濟基礎



從圖 2 當中我們知道在自民黨執政的基礎當中，族議員與官僚的結合與政治二世的大量出線加強執政黨與官僚體系的密切結合，經濟四團體與後援會讓自民黨與派閥因為政治資金而相互依賴，地方公共工程補助款與保護特定農產業的政策讓官僚與派閥相互配合，讓改革勢力無法順利進行，再加上分裂的在野黨及選區劃分對自民黨有利，形成自民黨再執政的利基（圖 3）。

圖 3 自民黨改革的阻力



柒、結論

從以上分析我們發現自民黨再執政的內在環境政治基礎為族議員與官僚



的結合及政治二世的大量出線，內在環境經濟基礎為經濟四團體及專業性後援會的經濟援助，外在環境政治基礎為分裂的在野黨、缺乏魅力的在野領袖及選區劃分的不平均，外在環境經濟基礎為地方公共工程補助款及保護特定農產業。這些政經基礎奠定自民黨過去長期執政及目前能夠再執政的環境與基礎。

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自民黨能夠再執政不就是日本選民投票下的抉擇嗎？既然自民黨是派閥政治及金權政治的主要運作者，為何日本選民還是選擇自民黨呢？原因便在於日本選民傳統上認為官僚比政治家更有政治權力，因此對換人及換黨的期待較低，因為選民認為主要決策在於官僚而不是自民黨，這也造成日本選民對於用政治方式來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認同，這種情況讓自民黨非常容易就利用組織戰來達到執政的目的，而以上所提及政經條件正好提供自民黨運作的環境；另外，必須要提及的是自民黨在 1993 年失去政權主要是來自其黨內的分裂，而不是來自在野黨的強力挑戰。

小泉純一郎上台之後打著「構造改革」的口號，但是從小泉上台以來所作的改革看來，其所遇到的阻力不是來自野黨，而是來自黨內派閥，根據最新的消息，自民黨以橋本派、江藤龜井派為主導將組成一個反小泉的聯盟，目前預計有 40 名自民黨議員加入（中國時報，2002 年 12 月 2 日：版 10），弔詭的是這些黨內派閥是黨內改革的最大阻力，但同時卻也是自民黨能夠再繼續執政的基礎。一個執政黨的改革成功主要是能夠擺脫保守官僚與傳統派閥的牽制，但是一個政黨能夠順利再執政，保守官僚與國會派閥的支持卻也是功不可沒的，但是它們卻也成為再執政之後改革的重大阻力。

參考資料

一、網站

- <http://www.dgbasey.gov.tw/dgbas03/bs5/quarter/>。
- <http://www.jimin.jp/>。
- <http://www.dgbasey.gov.tw/dgbas03/bs5/quarter.html>。
- www.nhk.or.jp/news/2002/11/05/k20021105000033.html。



二、中文報紙

〈日自民黨反小泉勢力公開化〉，中國時報，2002年12月2日，版10。

三、日文報紙

讀賣新聞，2002年1月30日，版2。

讀賣新聞，2002年10月28日，版1。

四、中文書籍

蔡增家

2003 〈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政治分析（1985-2001）〉，黃秀端主編，《政治學的發展：新議題與新挑戰》，台北：韋伯出版社。

五、日文書籍

塚崎公義

2001 《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中央省廳改革委員會編集

2001 《官界，官庁人事録：2001年以降省庁新体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中央省廳改革研究會編集

2000 《中央省庁再編》，東京：中央省庁改革研究會。

青木昌彦、奥野正寛及岡崎哲二編著

2000 《市場の役割，国家の役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大山耕輔

2001 《行政指導の政治經濟學：産業政策の形成と實施》，東京：有斐閣。

富森馭兒

1993 《日本型民主主義の構圖》，東京：朝日新聞社。

和田英夫

1994 〈政治改革關連法の成立：内容と課題〉，《法律のひろば》，47卷6號：6-7。

瀧澤中

2001 《政治のニュース》，東京：中經出版。

政治資金制度研究會編集

2001 《政治資金規正法逐條解說》，東京：政治資金制度研究會。

田中直毅

2001 《構造改革とは何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湯淺博

2001 《自民党政調と霞關國會族議員》，東京：教育社。

舛添要一

2001 《政治ニュースがわかる本》，東京：池田書店。

新藤宗幸

2002 《技術官僚：その權力と病理》，東京：岩波書局。

橋本五郎、飯田政之、加藤秀治郎

2002 《日本政治の小百科》，東京：一藝社。

石川眞澄

1989 〈社會党四十四年の歩み〉，東京：岩波書局。

高富通敏

1989 《社會党：万年野党から抜け出せるか》，東京：岩波書局。



原彬久

2000 《戦後史のなかの日本社会党》，東京：中公新書。

中村靖彦

2000 《農林族：田んぼのかけに票がある》，東京：文藝春秋。

河野龍太郎

2001 〈参院選後小泉改革は失敗する：地方経済の発展を妨げる既得権益団体〉，《エコノミスト》，頁 34。

齋藤精一郎

2001 〈構造改革の本質は『ノーペイン，ノーゲイン』に〉，《自由民主月刊》，2001 年 8 月，頁 39。

六、英文書籍

Calder, Kent

1993 *Strategic Capitalism: Private Business and Public Purpose in Japanese Industrial Fi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ristensen, Ray

2000 *Ending the LDP Hegemony: Party Cooperation in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urtis, Gerald

1999 *The Logic of Japanese Politics: Leader, Institutions, and the Limits of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ield, Karl J.

1995 *Enterprise and the State in Korea and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ggard, Stephan, Sylvia Maxfield, and Ben Ross Schneider, eds.

1997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tcher, Peter

1998 *The Ministry: How Japan's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 Endangers World Markets*. Boston,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Johnson, Chalmers

1995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Developmental Stat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Kurzer, Paulette

1993 *Business and Banking: Polit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wrence, Henry

2001 *Money Rules: The New Politics of Finance in Britain and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oble, Gregory

1998 *Collective Action in East Asia: How Ruling Parties Shape Industrial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orville, Elizabeth

- 2001 "The Illiberal Roots of Japanese 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 in Lonny E. Carlile and Mark C. Tilton, eds., *Is Japan Really Changing Its Way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121-125.

Pempel, T. J.

- 1998 *Regime Shift: Comparative Dynamics of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Bradley M.

- 1997 *Japanese Democracy: Power, Coordin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Zysman, John

- 1983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 Political-Economic Basis of the LDP's Return to Power in Japan

Zheng-jia Tsa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economic basis for the return to power of the Japanese LDP and to analyze the impact that these changes have had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networks, the major actors include ruling parties, bureaucrats, enterprises and legislatures. In the past,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promot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with one-party dominance and a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al pattern. Therefore, after the LDP's resignation in 1993 after 38 years in power, Japan's economy had not yet revived under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Taiwan, after three years of DPP government Taiwan's economy is still in decline. In the other case, after Kim Dae Jung came to power in 1998 and ended 37 years of authoritative governance in South Korea, the country's economy has obviously come out of the shadow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u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DP and enterprises, political donations from syndicates, local groups and professional groups still remained the major source of the LDP's political funds. On the other hand, Japanese enterprise donations to the LDP in the past were not completely handed over to the party headquarters to be distributed to congressmen within this party through each clan leader. This is the primary political-economic basis of the LDP re-governance.

Key Words: LDP, Junichiro Koizumi, Kim Young-Sam, Japan

